

清代涉台官式文书析要

王冠玺

(浙江大学 法律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宫中档》主要为清代皇帝的御批奏折及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奏折及其附件,清朝的各式要务及决策均载于档内。观乎奏折即能看出,清初三朝为帝国盛世,皇帝们施政宽严并济,对地方利弊了若指掌,议事思虑缜密,并且处置明快,大臣们亦多能勤勉任事。透过对清代涉台官式文书的研究,可见清代对台的关注与治理方略,并认识海峡两岸间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关系。

[关键词]清代官式文书;台湾史;折子;奏折;奏本;题本

[中图分类号]D922.05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5-0059-09

清代宫中档案所涉内容十分广泛,观乎台北故宫所收藏的《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内阁部院档》、《雍正朱批谕旨》等史料可知,举凡清朝对国家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等要务的决策与终极处置均载于档内。清代的官式文书均有定制,不但名称繁复(如朱谕、谕旨、诏书、奏片等),行文亦有特定的规矩(如明发上谕、廷寄、传谕等)。例如,“谕旨”是皇帝发布日常政令的载体总称,具有行政与法律上的双重意义,广义而言,谕旨中所言,尽皆法律也。通过对清代涉台官式文书的研究,既可认识当时的规章制度,亦可了解海峡两岸间源远流长的关系^①。

一、清代官式文书之源流及其释义

台北故宫现存的《宫中档》,主要为清代皇帝亲手御批及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满汉文奏折及其附件。所谓奏折,即臣工进呈君主的报告。清初本章,沿袭明代旧制,公题(题本)、私奏(奏本)相辅而行。各省总督、巡抚、顺天等府尹及盛京(沈阳)五部(无吏部)本章,均由通政使司转送内阁,称为“通本”;京内各部院府寺监衙门本章,附于六部之后,径送内阁,则称为“部本”。上述两者皆先经内阁大学士拟写票签,或双签,或数签,兼书满汉文字,进呈御览,以候钦定。标签各有成规,或拟“该部知道”、“知道了”,或书“依议”等字样。皇上可如所拟而择一签,亦可朱笔改定,另降谕旨。

“题本”与“奏本”均须投递通政司转呈,但奏本有时亦有不经通政司而径行至御前的密奏^②。

[收稿日期]2004-12-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王冠玺(1967-)男,台北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法及基础法学研究。

① 台北国父史迹纪念馆中的敬献孙文先生挽联即足资佐证:“中山先生千古。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北大台湾同学会敬挽。”

②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甲申载上谕云:“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康熙十一年(1672)清圣祖命开史馆纂修清世祖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世宗复令重加校订,参考异同画一译音,乾隆四年校竣成书。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部分藏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乾隆清世祖实录内所出现的“奏折”,似不经通政司而径自封的奏本。

清初采行的奏折,就是沿袭明代奏本而损益之的产物。奏折制度的出现,应该在康熙中叶,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苏州织造李煦请安奏折,及七月奏报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奏折并非因折叠而得名,折子的原意为清单,满洲语读如“Jedz”,它是汉文的音译。事实上,就文书上的意义而言,奏折是奏本与折子的结合名词^①(pp. 23-24)。奏折与奏本的功能不同,不论公私,凡是事涉机密,或是有所顾忌,虏获风闻等等,均在折奏之列。奏折若非应速递之公事,不准经由驿站驰递。

康熙一朝,奏折奉御批发还原奏者后,并无缴回内廷之例。雍正即位之后,始命内外臣工将御批奏折查收呈缴。雍正之意在于:“……凡一切事件,有皇父朱批旨意,亦俱着敬谨查收进呈,此旨。目今若不查收,日后倘有不肖之徒,指称皇父之旨,捏造行事,并无证据,于皇父盛治,大有关系。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存留,钦此。”^②自此缴批遂成定例。御批奏折缴还宫中后与御制诗文、各类清档、日记账簿等贮存于懋勤殿及保和殿东西庑中,后世遂将此批档案称为《宫中档》。奏折制度的出现,是清初本章制度的重大变迁,但是国家文书既有题本与奏本之分,又有奏折,名目实在过于繁多。奏本与题本的主要区别是内容上有公私之分,然而公私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事之公私,或介于两可,应题应奏,遂不免错误,虽资深老吏,亦往往不谙程序,违例题奏。奏折与奏本的功能虽然不同,其形式并非大相悬殊,当奏折普遍通行以后,奏本已名存实亡。清高宗于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颁谕废除奏本,奏本制度至此正式废止。

就清初而言,奏折只是君主广咨博采的工具,臣工奉到批谕后,若欲付诸施行,应该另行具本谨题,凡有一定成例可查照办理者,必须使用题本。藩臬等员于地方事务应详明督抚办理,若意见相同,督抚即当具题,若意见不同,藩臬始得折奏以闻。奏折并不能取代题本,题本与奏折必须并存不废,公题私奏相辅而行。直省督抚等缮写题本,例应将折本中之大意,摘写贴黄,贴黄不许超过一百字。此外又有副本,与正本一并递送内阁,等到奏旨后,内阁将副本遵照红本,用墨笔批录,另贮存于皇史宬;在京之各部院覆奏本章,亦比照办理。内阁于各省题本,遇有字画错误,忘记用印,以及违式者,均票拟交部议处。但因题本袭用日久,习为故套,流弊颇深。督抚于寻常题本,率委之书吏缮写,并不留心阅看。部院题本,陋习相沿,也不能实心办理。刑部堂官因题本繁多,往往先行画题(先行办理),以待临时依次进呈,至于事件的情节,并未细心详度。各部院事件,虽关紧要,但题本积压的情形,却极其严重。自乾隆年间以降,已多改题为奏,奏折遂多于题本。例行题本,碍于体制,既有副本,又有贴黄,辗转呈递,繁复迟缓,改题为奏,简便易览。清季讲求变法,废除题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张之洞等具折奏请将题本“永远省除”,同年八月,下令废除题本,奏折终于取代了题本,成为京中外省通行的重要文书。

清代《宫中档》的内容,不限于奏折,尚有其他文书,例如:“谕旨”、“清单”、“夹片”、“书札”、“图片”及“供词”等,多为奏折的附件。所谓谕旨,种类颇多,其中朱笔谕签是附在奏折内的谕旨。宫中档所存朱笔密谕,主要为君主批览奏折发还原奏人时附入封套内的谕旨,就是奏折的附件,此类密谕是探讨君臣关系及地方吏治的数据。

自雍正以降,清代的权力重心移转至军机处。据赵翼《檐曝杂记》云:“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中,谕旨或有令南书房翰林撰拟。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也。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倖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此矣。直庐初仅板屋数间,今上特改建瓦屋。”^③(p. 1)事实上,军机处估计于雍正四年(1726)以后才存在,其后不仅掌戎略,

① 详见《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吴升奏折》,载《宫中档》第79箱第93包2642号,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举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逐渐取代了内阁的职权,成为清政府政令所自出之处^① [1 p. 126]。清史馆纂修《军机大臣年表稿本》原序云:“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何其隆也。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盖隐然执政之府矣。自高宗后百七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虽处之僚属,百尔执事,且美之惮之,而况乎所谓大臣者哉。”^② 故此探究权力中枢在当时面对台湾事务所采取的态度,出自军机处的档案是最须注意的部分。

办理军机处所抄录的奏折副本,是按月分包储存的,所以叫月折包,简称折包。据《枢垣记略》中描述:“凡发交之折片,由内阁处交还及汇存本处者,每日为一束,每半月为一包,谓之月折。”^③ [4 p. 6] 惟月折与月折包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清代文书制度,奏折可分为不定期与定期等类,臣工具折,凡有闻见,或经办公事件,均应随时缮折入告,至于京中各部院衙门按月汇报的清单等文书就称为月折,其内容多属例行公事,例如雍正四年十月,雍正谕大学士、九卿等关于用人行政。略谓:“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认识者甚少,及即位后,有内外员缺,宁能不用人乎?……故大自督抚提镇,至于道府参游州县,每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将吏兵二部月折,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④

在记档登录时,其谕旨明发者,注明“交”或“交内发”,或同部折交,即交内阁,折片注明“存”字者,即留中不发,多归入月折包内;凡谢恩、陛见例不录副存档者,则注明“不抄”字样。交兵部由驿站驰递的谕旨及发回的折件,多注明马递里数,如“马上飞”、“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或“六百里加紧又紧分寄”等字样。此乃每日传递之最低速限的规定,亦即一日至少行四百里或六百里,最高可达八百里。有清一代的谕旨,性质种类不一。据《钦定大清会典》所载:“凡特降者为谕,因所奏请而降者为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为谕。其式,谕曰内阁奉上谕,旨曰奉旨,各载其所奉之年月日。”^⑤ 另据《枢垣记略》云:“……述旨发下后即交内阁传抄,谓之明发,其谕令军机大臣行,不由内阁传抄者,谓之寄信。”^⑥ [4 p. 12] 君主持降的谕旨,由内阁传抄后宣示中外,故又称为明发上谕,并冠以“内阁奉上谕”字样。明发上谕最早系由大学士撰拟,乾隆间以降,已由军机大臣撰拟。寄信上谕由军机大臣撰拟呈览,经述旨后交兵部,以寄信方式由驿驰递,因其寄自内廷即军机处,故习称廷寄^⑦ [5 p. 70]。“揭帖”乃清代题本复份之一种,题本所涉之事应经有关部院复议者,具题之人应另备复份曰“揭帖”,以知会相关之部院及各该科^⑧ [6 p. 5]。“程限”是指两地间传递官文书之法定时限。清制,传递公文以日行五十里为常,计两地之距离乃得其程限。本案州距府 590 里(295 公里)应限 12 天,府距省 1080 里(540 公里)应限 22 天,故此处称:“共扣程限三十四日”^⑨ [7 p. 291]。应注意者系此处之所指,非以驿站传递公文,当系以行走之方式来计算,其与前处所指之日行三百里(150 公里,清代驿站传输公文之最低日行速限)并不相同^⑩。

乾隆之后奏折已可用作公文,保密不易,臣工乃于一折之内附以“夹片”,或以密陈机要,或以附述他事。嘉庆斥为恶习,谕令禁止附叙他事之片,但“有实当紧急事件,不得不夹片密陈者,仍听之”。然此谕亦未严行,故夹片之用日广^⑪ [6 p. 439]。

① 详见李宗侗《办理军机处略考》,载《幼狮学报》1995 年第 1 卷第 2 期。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9 年版。由于庄著未注明页码,特此说明。除此原因外,以下本文中所引部分参考文献未有页码者,系因一般人不易进入台北故宫查阅文物,作者仅能转引之,而庄教授于台北故宫任职,其所查阅之史料多为文物,其时尚未整理出版,故无页码。

② 详见《军机大臣年表稿本原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③ 详见《雍正四年十月甲戌上谕》,载《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 49 卷,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④ 详见《钦定大清会典》第 3 卷,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⑤ 台湾师范大学庄吉发教授曾就此问题于台北故宫图书馆向笔者口述解释。

⑥ 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张伟仁先生说过:“同时,我们为了了解本所一些特殊文件的性质和由来,又曾再三向庄吉发先生请教清代的奏折制度和宫中档及军机处档的情形,承他耐性地说明,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基本问题。”(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 年版)所以,庄先生的看法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二、清初三朝涉台奏折选录

康、雍二朝的折子,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未辑录,盖为清朝其时亦未为妥善之整理分类;至于乾隆以后,故宫博物院依照时间顺序汇集成册,仅乾隆一朝即有五百以上涉及台湾事务、发自内廷由皇帝亲自批过的折子,此后的年代,言及台湾的折子则愈来愈多。在一个偌大的专制帝国中,地处边疆的台湾会被投注这样的关切,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的。笔者在此依据《清宫谕旨档台湾史料辑》中之年代序列,略去单纯的人事任命奏折,选录部分乾隆中期以前的折子予以介绍。

(一)康熙朝

台湾为海防要地,也是东南沿海的屏障,所以康熙王朝特设重镇,兵丁皆从内地调戍,其总兵一职,必须宽严相济,始足以资管理,但历任总兵皆居官平常,废弛营伍。河南巡抚杨宗义就曾经具折指出:“闻得有在台湾出者云,台湾之兵,有换班之名,而无换班之实,大废立法之意也。”例如总兵王元年齿已衰,调任台湾以后,驭兵不善,以致兵丁哗变。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初三日,闽浙总督梁鼐与漕运总督桑格在浙江湖州府会勘建闸疏河处,接到福建威略将军水师提督吴英手字,讯此事。其函札略谓:“台湾镇标戎旗兵丁为赌博之事,有该镇传事领旗袒护随丁,只责营兵,众兵以其端擅不公,赴该镇呈诉。而总兵王元听信先入之言,竟无发付,遂至众兵喧噪,勒令罢市,赴道擂鼓,齐集较场。经道府厅县暨台澎二协副将多方晓谕,众兵勒要责革传事领旗随丁参人,并保众人日后无事。该镇无奈依行,然后解散。又称该履任以来,日以沈醉为事,兼之传事诸人壅蔽,致有是举等情。”^①台湾镇总兵员缺,原系奉旨拣选,其后改为论俸挨次调补,其缺点在论俸调补时,未必皆得其人。闽浙总督梁鼐接获吴英手札后即具折奏请将总兵王元革职,另拣贤能补授。在原折内附朱笔谕旨一道云:“王元即黄元,先任沙虎口副将,朕向所深知,为人胆量虽好,做官平常,所以不得官兵之心,原不欲用,因他海贼出身,惯晓海外情形,故亦勉强用去,近日果有此事,尔等再细察访奏闻。”梁鼐遵旨将王元偏听轻躁,嗜酒废事,出言不善,致激众兵喧噪实情,具折复奏。王元因患吐血病症,于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身故。梁鼐后来又指出总兵一官,关系封疆,其员缺尤为紧要,闽人生长海滨,熟悉海上情形,惟台湾兼统水陆,地方辽阔,番社杂处,以闽人而居总兵之任,则其左右用事者必皆闽人,其亲戚知交到台郡探望贸易,因而借势招摇,俱所不免。至于从内地调戍的兵丁亦多有本官同里共族之人,遇事未免徇情。因此梁鼐认为,台湾总兵一缺,闽人“似非所宜”。定例台湾一郡,其大小各官,概从内地调补,自同知、知县等官,向由福建巡抚会疏保题。康熙四十七年十月间,因有台湾同知孙元衡升任等缺,梁鼐以浙江杭州府理事同知岳色勤慎练达,实心办事,调补台湾府同知员缺,最属相宜,但因岳色为浙省官员,又是满洲,福建巡抚不便越例题调,梁鼐具折奏请圣裁,清圣祖批谕云:“满洲从未用过,另题。”^② pp. 23-24)清初三朝为清帝国之盛世,大臣们多能勤勉任事。玄烨对用人施政、地方利弊,多能了如指掌。满人自然有处事干练的能员,但一来言语不通,二来对南方及海外岛屿情况不易有底层的了解,为了避免贵族子弟涂炭台湾黎民百姓,康熙的看法是值得赞同的。

(二)雍正朝

有清一代,盛行于南方的会党,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异姓结拜组织与械斗团体,它的起源与闽粤的社会经济背景实有密切关系。福建泉、漳二府各族姓之间,动辄聚众械斗^③ (p. 27)。福建总督高其

① 载《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1辑》,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倬于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十七日即具折指出：“查福建泉漳二府民间大姓欺凌小族，小族亦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最为恶俗。”^[1]雍正七年(1729)十月十六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具折上奏。奏折中称：“查泉属七县，晋江、南安、同安最为难治，安溪、惠安次之，永春、德化又次之。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现在严飭地方官查拏禁止，伊等稍知敛戢，无有械斗之事。其晋江之施家即施世纶、施世骠之族也，人丁最多，住居衙口、石下、大仑诸村，贩私窝匪，强横无比……”^[1]晋江人施琅降清后，屡立战功，康熙三十五年(1686)卒于官，其子世纶仕至漕运总督，世骠仕至福建提督，世范袭三等侯。晋江小姓苦于施家等大族的凌虐，故结连相抗，秘密会党就是由异姓结拜组织或械斗团体发展而来的犯罪组织^[1]。

福建总督高其倬于雍正六年(1728)八月初十日奏报台湾汤完等结盟拜把一折内云：“臣查台湾地方，远隔重洋，向因奸匪曾经为变，风习不纯，人情易动，此等之事惩治当严。况福建风气，向日有铁鞭等会，拜把结盟，奸棍相党，生事害人，后因在在严禁，且铁鞭等名，骇人耳目，遂改而为父母会，乃其奸巧之处。臣查结盟以连心，拜把以合党，党众渐多，即谋匪之根。”^[1]据高其倬称，台湾父母会是由铁鞭改名而来，铁鞭会是因会中弟兄各执鞭而得名，父母会则因拜把结盟的会员每人出银一两；如有父母老了，彼此帮助，故称父母会^[1]。由此可知，台湾早期的泉、漳械斗是历史性的仇恨所致，非仅因在台地权、水权分派不均缘故。

闽省漳泉两府，地窄人稠，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向来是由台湾道府于每年正月日起至五月止，每月碾米1万石(100万升)，以5000石(50万升)运往漳州，以5000石(50万升)运往泉州，交各道府平价售卖^[2]。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具折时亦云：“台湾虽属悬海一区，见今地辟民聚，乃圣祖仁皇帝开拓疆土，与我皇上之收服西海，先后一辙，昭垂史册，照耀万古，必须规画尽善，使有盘石之安。溯自归入版图以来，其地所出米谷豆麦，闽省数十年来，民食大有攸赖，即如浙江米价腾昂，督臣觉罗满保亦系雇备商船采买，源源赴接济。再如江浙两省民间所需糖货，均为仰赖台地帆贩贸易，且沿海州县数十年并无海寇之警，亦无匪类久聚者，诚以台湾要地扼在海外，其余即有零星孤岛，不堪容足以为巢穴故也。是台湾安，则不特闽地安，即江浙以北，亦可以无匪类出没之虞，是不特八闽屏蔽，直且拱卫神京矣。”^①上面这个折子说明了雍正初年以前，大陆东南省份在经济上对台湾就已经十分依赖，为政者不仅清楚此点，并且看见了台湾岛的军事要塞地位，以及台湾治则江南治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 乾隆朝

1. 乾隆六年(1741)五月：

五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台湾地方上年秋间缺雨，收成较常歉薄，乾隆三年以前未完人丁正杂钱粮税银等多年旧欠，概行豁免。^[8]

2. 乾隆十年(1745)九月：

九月二十日奉上谕，着将台湾府属一厅四县，丙寅年额征供粟全数豁免。^[8]

第一个折子，系因歉收而降旨免征，第二个折子提及台湾向来只征粮粟，不征银两，今上既已免闽省钱粮，若不连台湾同免，非其普遍加恩之意。

3. 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台郡采买之弊由地方官乘机私买射利，着传旨巡台御史六十七等，令协同地方官妥协办理。^[8]

① 详见《雍正二年九月初三蓝廷珍奏折》，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湾开垦渐多,大量谷粮卖往内地,其价理应低反高,中有不肖官员趁机私售私买谋利,乾隆下旨察明原委。

4. 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

三月初三日奉上谕,陈大受奏,巡台御史于养廉外,又分派台凤诸彰四县轮值,每季约需银三四百金等,历任巡台御史俱着交部严察。^{[8] p.8)}

议奏本折指出在台御史搜刮民脂;“清廷以台湾为海外要区设立巡察御史以表正风俗,稽查弹压,除剔弊端”,但其玩忽职守,公然勒索,交部从严议处。

5. 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

四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诸罗县奸民吴典等纠夺犯等两案内为从各犯,着入于本年秋审情实具题。^{[8] p.14)}

本折说明,纵于停止勾决六年,如遇重犯与寻常谋故斗杀等不同者,予以斩监候,属法外施仁;久未显戮,地方百姓渐忘肃刑昭炯戒,故重案者,即使停决之年,亦请旨正法。

6.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

二月十七日奉上谕,闽省赴台换班及班满撤回各兵间,有遭飘风至粤境,嗣后着分别酌量赏给月饷着为定例。^{[8] p.17)}

折中指出,渡海换班时因风灾而飘至广东境,沿途告借州县,以往均降旨豁免,非为成例,日后定例视受困轻重赏给月饷。

7.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

五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票拟误将台湾令章士凤革职,问,签为革职着交部察议。^{[8] p.19)}

台湾令章士凤等,渔利剥商,纵囚匿报,派赃累累,原应革职拿问,大学士等票签错误,为乾隆发觉,失察之大学士交部议处。

8.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

六月初三日奉上谕,福建水师将弁多用本地之人,所属兵民多朋侪姻戚,不避嫌疑,往来杂沓,嗣后伍弁任本地务宜渐除旧习恪守官方。^{[8] p.22)}

此为两难,概可避嫌免亲朋之累者,于洋面风涛不克胜任;本地之人又难以回避,故下旨再晓谕要时相规勉,勿徇私褻体。有学者以为,清廷不信任台人,故不任用之,其论点未虑及前折所虑便得结论,若干见解似可再议。

9.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日兵部遵旨议奏,绿营千总俸满(即任官到期)甄别及按年汇奏之处。^{[8] p.25)}

例限绿营千总以六年俸满离任,各省升迁未尽遵此例,在台者有三年,俸满回省后缺者,新职尚且不明,旧缺无人递补,日后各项回任候升及留原任者,俱换给札付,令其照旧任事。

10.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

十月十九日兵部题闽浙二省,于学习世职及澎台俸满把总候补千总之武举等,通行调取考验详加甄别,于戎政营伍不无裨益,恭候命臣部通行直省一体钦遵办理。^{[8] p.37)}

此折原档残缺,大意为加强武职人员本质学能,以免遇缺无堪用人才可补。

11. 乾隆二十九年(1764)九月:

九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御史李宜青条奏台湾事宜,用意取巧器小,着传旨申飭。^{[8] p.46)}

此折显示出乾隆问政英明,用人施政之正大平和取向;李宜青在台即已发现弊端,依其官职,本应即刻向驻台地方官员商研谋改进之道而不为。未料回京却以在台所见为其独得之秘,条陈其弊,上邀恩宠,以博高名,置民政、僚属之谊不顾,用心鄙琐,传旨申飭。但所奏各条不必以人废言,仍交

部议处。本旨之弦外之音，系为李宜青所陷于不义者系满员。弘历此举是否有偏颇之意不能肯定，但申饬李宜青之谕旨反映出了当时在台满员的玩忽职守，观察政事不若汉大臣。

12.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

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贼匪黄教纠众不法，台湾镇总兵王巍观望畏葸，着革职，所遗员缺着叶相德补授。^{[8] p.59)}

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台湾道张珽，于办逆匪黄教案不亲往督捕，存心讳饰，着革职，孙孝愉着以按察使衔管理台湾道事务。^{[8] p.60)}

黄教因伙窃牛只闻捕潜逃，及捕快前往拿取时持刀拒捕伤人。总兵王巍、台湾道张珽未亲往剿匪，仅派把总搜山围捕，一个月后才亲自带兵查捕，难胜大员之任，着革职查办。

13.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

二月初八日，尚书额附公福隆安字寄大学士管闽浙总督三宝等，奉上谕台湾各属本年额征供粟全行豁免，闽省民间米粮是否充盈无须台粟接济。^{[8] p.71)}

二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台湾府属本年额征供粟全行豁免。^{[8] p.73)}

距前次豁免征供(乾隆十九年)已有26年，据折中所示可知，乾隆十年之年额征供为16万石(1600万升)，至四十五年依然为16万石(1600万升)，并未增减。

14.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

十月十三日奏为遵旨，传询巡视台湾给事中塞岱等，奏折传送到京系经福建督抚衙门情形。^{[8] p.78)}

折中载明，向来台湾御史有寻常上奏事件，系由台湾差家人送至福建督抚衙门，复由福建督抚差人送京。

15.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

十一月初三日，尚书额附公福隆安字寄云贵总督富纲等，奉上谕富纲在闽抚任内诸事废弛，姑准其议罚，着将此项罚交银两解送浙江海塘留备工程之用。^{[8] p.81)}

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台湾书吏诈赃滋扰道府厅官通同一气作弊闽省诸事废弛，富纲陈辉祖着交部议处。^{[8] p.83)}

十一月初六日尚书和珅字寄云贵总督富纲，奉上谕富纲前于诸罗凤山两案从宽交部议处，着传旨令其再行议罪。^{[8] p.85)}

十一月十二日，尚书和珅字寄云贵总督富纲，奉上谕富纲于台湾生番逞凶之案应办不办，诸事废弛，再传旨严行申饬。^{[8] p.88)}

16.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

十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巡台御史塞岱雷轮，于台湾所属诸事废弛，所无一语入告，塞岱雷轮俱着交部察议。^{[8] p.91)}

十二月十七日，尚书和珅字寄云贵总督富纲，奉上谕闽省诸事废弛，富纲前任巡抚今已擢授总督，若仍复模棱将难逃罪，将此谕令知之。^{[8] p.94)}

上列几个折子大概说明了台湾书吏任内因循废弛政务，朝廷仅降旨略表责难之意，该员竟仍高升总督，由此可见，乾隆晚年政事败坏已露显兆。

17. 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

六月十三日，尚书额附公福隆安等字寄闽浙总督陈辉祖等，生番戕杀多命，应交该镇道办理。^{[8] p.106)}

其内容略为：戕杀多命之凶番茅歪等十二名……押解至省率同两司详细审案问明定拟后，即一面奏闻一面先行正法，传首台湾俾各番知警惧。福隆安等认为生番胆敢于村民林妈等出界采樵即

肆行杀害二十余命,并割去头颅。此等凶番应就近申明后即予正法,何必过海解省,正法后又传首回台,真正多此一举。

18.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月:

十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民人聚众械斗,泉州府属有伤兵夺犯之盗,该镇道不前往、该抚安坐,省署陆路提督亦不亲往,俱着严行申饬。^{[8] p.111)}

十月二十一日,尚书额駙公福隆安等字寄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奉上谕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民人聚众械斗,泉州有夺犯砍伤兵丁,总督陈辉祖一味牟利,武备废弛,着将陈辉祖严讯归案定罪。^{[8] p.117)}

十月二十四日,尚书额駙公福隆安等字寄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奉上谕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民人互相械斗,黄仕简迅即带兵渡台查办,殊属可嘉着勉力将首伙要犯严拿。^{[8] p.123)}

十月二十六日尚书额駙公福隆安等字寄闽浙总督富勒浑等,传谕按察使銜台湾道杨廷桦,奉上谕,台湾地方漳泉二郡民人械斗,该府苏泰奏情形已宁帖,恐不无姑息了事,着责成黄仕简、杨廷桦二人办理,务将杀害汛弁各庄械斗伤人及放火抢夺各要犯上紧缉拿。^{[8] p.125)}

上列数折均言台湾械斗之事,其原因除漳、泉二府民俗素称犷悍外,还在于陈辉祖在浙一味营利谋私,以致武备废弛,遇事又推诿观望,而雅德及李奉尧二人未能立即亲往,一并议处。十月二十五日折子言及防止在台官员粉饰太平,以六百里加紧传谕相关人员,务将匪徒一网成擒,之后到来的六七个上谕均与此事有关。

清代官式文书包含的范围极为广泛,应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对清朝有全面的认识。而以涉台奏折为研究对象,能更清楚地认识两岸间长久的紧密关系,这是少数持有党见的独派人士并不能就此轻易串改编造的。甲午战败,日人要求割台,光绪曾言:“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马关条约》是在“(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的悲痛心情下签批的,而朝野的反应更是空前激烈^①。透过对清朝官式文书这一视角以探溯两岸历史上的源流,能说明的事情虽然有限,却能清楚地看出两岸间的一体性关系。惟其必须期待的是各界方家将研究扩及此一领域,以让更丰富的典籍史料来说明史实。

[参 考 文 献]

- [1] 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9.
- [2] 赵翼.檐曝杂记·第1卷[M].台北:中华书局寿春白鹿堂重刊本,1957.
- [3] 李宗侗.办理军机处略考[J].幼狮学报,1959,(2).
- [4] 梁章巨.枢垣记略·第22卷[Z].台北:中华书局,1997.
- [5] 庄吉发.清代上谕文件的史料价值[J].故宫季刊,1984(12).

① 签订《马关条约》后不到一个月,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等共五百余人次上折上书共一百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的。康有为连夜写成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梁启超、林纾等八十余人亦指出:“割让台湾等地,天下闻之,未有不震动发愤、痛心疾首者也。”陈孔立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中总结道:“从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止,前后22天,先后有在京的各省举人3000余人次共上书38件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而《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更引起极大震动。李家怡《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中日命运的决定战》云:“台人骤闻之,若夜半暴雨雷霆,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是时,风云变色,若无天地,澎湖之水为之不流。”实际上,最后日军进犯台湾的死伤人数超过了其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数字。详见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china/twhistory-43.asp>。

- [6] 张伟仁. 清代法制研究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
- [7] 张伟仁. 清代法制研究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
- [8] 洪安全. 清宫谕旨档台湾史料 :[Z].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96.

[责任编辑 何海峰]

Taiwan-Related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WANG Guan-Xi

(*Department of Law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Official fil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covered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 including its politics , military forces , and legal system , among other things. The processes of policy-making and decision-making for material matters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carefully recorded in such files.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imperial age had many different names. Not only did th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such official documents vary , but these documents were also subject to different formats.

The " Imperial Files " currently preserved in the Palace Museum of Taipei encompass various zouzhe ([private and/or official] court official ' s memorial to the throne) reviewed by Qing emperors or by Ministers of State authorized by the emperors ; annexes of zouzhe are also included. After a zouzhe was reviewed by the emperor , it would be returned to and properly archiv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 the Forbidden City , along with other official files. The collection of those files is called the Imperial Files.

The Imperial Files kept in Taipei ' s Palace Museum do not include any jedz / zhezi (a variety of zouzhe) from the time periods of Emperors Kangxi and Yongzheng. As a matter of fact , however , quite a few jedz from those time periods did refer to Taiwan affairs. There were more than five hundred jedz pertaining to Taiwan affairs reviewed by Emperor Qianlong during his reign , which followed those of Emperors Kangxi and Yongzheng. Thereafter ,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jedz that discussed issues regarding Taiwan. Judging from the zouzhe being produced ,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the reigns of the above three emperors were the most prosperous time in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were working extremely hard. Moreover , the three emperors were very capable of recruiting people and implementing their policies , because they were well aware of local conditions and could make quick but careful decision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clashes between Taiwan ' s two opposing ethnic groups were caused by long-existing hostility and hatred , rather than matters as simple as unequal divisions of rights to land and water. Emperor Qianlong wa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the frequent disturbance in Taiwan , and had waived and reduced taxes for Taiwanese people during his reign.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are very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Most importantly , through studies of Taiwan-related materials of the Qing Dynasty , it is easy to recogniz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 which dates back to at least 300 years ago , and the close attention that the Qing authority paid to Taiwan.

Key Words :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 Taiwan history ; jedz / zhezi (a variety of zouzhe) ; zouzhe ([private and/or official] court official ' s memorial to the throne) ; zouben ([private] a variety of zouzhe) ; tiben (official memorial to the throne)